

历史上那些慈善面孔

◆ 亦必威

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儒家的民本思想,自古以来,中国涌现了许多民间慈善家,他们或是大商人,或是官员,以自家的资财资助着贫困孤病之人。

慈善家中多缙绅

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。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,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,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,而且更名易姓为陶朱公,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。

不过,鲜为人知的是,范蠡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。《史记》称他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,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”。因此,他被赞为“富好行其德”的大善人、大慈善家。

汉代的大慈善家也不少。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是其一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,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,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。他家里有不少“池鱼牧畜”,凡有求鱼及牲畜者,有求必应。

两汉时期有许多地方官吏也是慈善大家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,在任扬州刺史时,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,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。他任泉州太守时,也不时“养视鳏寡,贍助贫穷”,大行慈善事业,以致泉州境内“田者让畔,道不拾遗”。

西汉名臣召信臣,则在郡中大兴水利,“躬劝耕农”,广行善事,以致郡内殷富,他被百姓尊为“召父”。

东汉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,官至三公九卿,被皇帝尊为“三独坐”,权势很大。但他一生节约,从不浪费,“服布衣”,“蔬食玉器”。他把历年所得薪俸,全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,以致逝世时,“自无担石之储”。另一位名臣王丹,虽“家累千金”,但他把

财富全部赈济贫困百姓,博得“好施周急”的美名。最有意思的是,每当农忙时节,他带着酒菜到田间,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。

南北朝时,地方官员中也常有慈善家在各地大行善事。北魏时有“良吏”路邕,任魏太守时,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,去赈济贫苦百姓。另一良吏闫庆胤,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时,正遇荒年,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“赈恤贫穷”,使多个困难家庭得救。

最值得表章的是隋朝“循吏”公孙景茂。隋文帝时,有伐陈之役,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,景茂主动要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,因他的善举而存活的人达1000多。后来他任道州刺史时,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,“散惠孤弱不自存者”。

另一位隋朝知名“循吏”辛公义,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。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,当地多灾多病,而百姓又特怕染病,“一人有疾,即合家避之”,以致“父子夫妻,不相看养”。辛公义决定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召百姓。当暑月疫情最严重时,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床板抬到自己家来,病人达到数百,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。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,终日与病人相对询问。这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,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,结果病人全部痊愈,也从此改变了当地的陋习。

出家人也问世事

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,

入史的也不少,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名气尤盛,其事迹甚至被记载在东南亚多国史籍中。他的善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。北宋徽宗政和六年(1116年),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,募捐筹集资金,在潮阳修建和平桥,含辛茹苦历经12年建成。当地居民感恩戴德,在桥旁建立了“报德堂”祭祀他。此后,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,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。

清朝至民国,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,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。1929年,当地人所写的《祖师纪录碑》中,详细记载了这位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:“宋大峰祖师,闽人,为宣和时高僧……劝喻潮人造桥、修路、施棺、殓殓、救人、赠药、赈灾、恤困等善举,毕生不倦,开化潮人不少……各县遂风起云涌,奉祖师神像,力行善举。”

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。泰国曼谷有大峰祖师庙,还成立了民间慈善机构,在此基础上又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起泰国华侨崇圣大学。可以说,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。

民间慈善成风气

明末清初,江南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。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,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,反对宦官黑暗统治,集会抨击腐败政治;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,寒者给衣、饥者给食、病者施药、死者施棺,有的还筹集经费,给贫困儿童办学。

知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、钱一本、陈幼学、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,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。它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创办,后来

中心迁至江苏武进,地区扩大到无锡、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。同善会重在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,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、节妇和贫老病者,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。同善会的活动,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,日本学者夫马进还专门著有《同善会小史》。

在同善会的基础上,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发展迅速。据有关史料统计,仅苏州一地,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120多个,上海地区也有80多个。它们有的建起育婴堂,专收弃婴抚养;有的办仁济堂、同仁堂,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……

由于地方官员的介入,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,史载乾隆年间元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1.3万多亩,一次即得到官助银1.2万多两。

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,还定期向广大民众讲学,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。日本学者酒井忠夫的《中国善书的研究》,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。

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应当提及,一是陶澍,一是林则徐。陶澍是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,曾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,在慈善事业上他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。道光三年至五年(1823至1825年),陶澍任安徽巡抚,恰逢大火灾,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,定名为“丰备义仓”,意为“以丰岁之有余,备荒年之不足”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,终于同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,地址选在江宁、苏州地区。这年初,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10间大小仓库,从无锡买粮存放。因其在今江苏长洲、元和和吴三地,历史上把

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“长元吴丰备义仓”。从1835年至1860年20多年间,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。

鸦片战争后,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。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,为新疆人民谋福利,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。

清朝晚年,长元吴丰备义仓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,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,不仅灾荒赈济粮食,还筹建“协济粥厂”,后来又兼管失业户的救济。清末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这里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“儒孤学堂”,后来又扩建了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“贫民习艺所”,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。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。

慈善日渐公益化

时至19世纪90年代,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中国,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中国学术界,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《善举》一文中,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,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,遍设西式善堂。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。

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着共同的方面,即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儒家的民本思想,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。但西方近代慈善活动不仅限于对鳏寡孤独、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,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,使慈善事业更加积极主动。

今天,中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变,这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当今中国社会的需要,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。

摘自《环球慈善》2011年11期

家事 国事 天下事

2012 新民晚报

与您共同见证历史

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

美、俄、法等国举行大选 “蛟龙”海试争破7000米世界纪录

7月28日-8月12日第十三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

“神九” “神十” 载人登“天宫”

关注CPI指数走势